



国术表演留念



王子平(中)游西湖与同仁合影。



高芳先教国术。

第三回

日军打压引公愤，国术馆人遇国难

四年的光阴飞速而过。高作霖与武术爱好者切磋的和谐场面，被日本人的入侵打破。

当年，青岛国术馆的练习所遍布各处，在日本纱厂做工的工人，也有一个练习所。1936年11月，青岛日本九大纱厂工人，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家残酷压榨举行大罢工。然而，“没想到，不但遭到厂方拒绝，还被厂方以武力镇压。甚至被强制开除，一天早晨，在青岛国术馆纱厂练习所学习的小刘去纱厂上班，走到大门口，就被日本门卫拦在门外，并扬言要开除他另换新人。小刘将门卫和后来赶来的六七个日本人全部打倒在地”，高作霖先生生前回忆说。

小刘见势不好，逃走了，却给青岛国术馆招来了大麻烦。事件发生后，日本哪肯善罢甘休，厂方立刻将此事报告给了日本驻青岛领事馆，领事馆马上派人向沈鸿烈交涉，要求严惩凶手，立即解散青岛国术馆。未料到，沈鸿烈不吃这套，一口回绝：“国术馆是中央办的，我管不了。”碰了钉子的日本领事馆添油加醋地给日本政府发电，声称中国工人结社，欺负日本人。于是，日本方面调集了九艘军舰和千余海军陆战队，将青岛港包围，事态急剧恶化。沈鸿烈不是吃素的，见此情况，“随即命令将他统帅的渤海舰队第三舰队军舰上的大炮卸下，运往布防阵地，炮口全部对准日商纱厂。又动员了全市国术馆的市民，发放长矛大刀，把守在市区各日本侨民集居处的战略要点”（《青岛国术馆遭遇国难》）。让沈鸿烈没有想到的是，他请示蒋介石，得到的是“只要日本人不开枪，就不理他们”的答复。无奈，沈鸿烈撤除了警戒岗哨。日本人见此情景，立刻包围了青岛市政府和国术馆。

“当时我正在国术馆对面房子里睡觉，听到嘈杂的人声，知道出事了，从窗口望去，看到有一百多个日本兵荷枪实弹地围在国术馆门前，我住的门前也站满了日本兵，一会儿又

看到十几个日本兵押走了杨明斋老师，从向秘书家里抓走了向誉久秘书”。其实，日本人早就对国术馆不满，因为杨明斋他们在国术馆里给学生灌输热爱祖国、反对日本侵略的思想，本以为可以趁此机会端掉国术馆，没想到此举激起了民愤，“杨明斋的两千多名学生以及社会各界纷纷要求放人，几天后，由于日本人对于国术馆煽动抗日的证据不足，又考虑日本侨民在青岛的利益，被迫将杨明斋以及其他国术馆骨干释放”。

事件平息后，国术馆修复门窗，大张旗鼓地重新挂牌办学，并在青岛市体育场举办国术表演，重新使国术馆活跃起来。就在这场表演中，吸引了一位年仅5岁的小学员，他的名字叫鲁约翰，也就是后来的文史专家鲁海。

“那场国术表演中，最后一个表演，只见师傅头和脚是两个长板凳，头在一个板凳上，脚在一个板凳上，本身这么躺着就是一个功夫，他躺在上面，有4个人放了一块大石头在他身上，最后那个大锤把石头砸碎了，不得了了，看得小孩们又跳又叫的，后来我父亲说叫我学，我说我去我去！以后才知道那个人是杨明斋”，鲁海先生告诉半岛记者，他自幼年身体孱弱，所以父亲决定送他去学习武术强身健体，“我所在的传习所在云南路上的台西镇小学礼堂（今24中）。我们这期学员三十多人，年龄相差很大，大的有三十多岁，我最小只有5岁，要求必须剃光头，每天晚上上课。我们先学的是拳术当中的入门‘十八路弹腿’，学完之后学长拳，然后学器械。一共练了7个月”。

然而1937年的一天，青岛国术馆及所有练习所，突然匆匆颁发了结业证，全部的课程戛然而止。

在时局面前，青岛国术馆只能妥协，宣布解散。然而，早已弥漫于青岛的中华武术精气神却从未间断。私下传授武艺的活动，仍然屡见不鲜。

第四回

抗日爱国续武魂，大刀砍向侵略者

高作霖不舍地离开了青岛，解散后的国术馆人，命运迥然。“1938年元旦刚过，沈鸿烈潜入沂蒙山区组织抗日，杨明斋老师也跟沈鸿烈走了。我和师弟纪雨人与杨老师分手后赴后方，到了西安又分了手，他去了兰州，我留在西安。哪知道这次分手竟成永别，杨老师在与日寇作战中阵亡，纪雨人音讯全无”。

日本侵占青岛后，对国术和国术馆心有余悸，他们极力制止人们练习武术，甚至不让老百姓到山上去练刀剑拳脚。然而，他们怕什么来什么，国术馆里英勇的战士们确实让他们坐卧难安。虽然杨明斋他们走了，但还有一部分国术馆师生，自发组织了抗日游击队，与日军在崂山周旋。曾经的武林高手，化身为战士，组成大刀队。

大刀队在青岛国术馆的地位不菲，在青岛市档案馆翻看旧档案，一则《关于寄送“砍刀术练习法”一册的函》引起了半岛记者的注意，在函中我们可以看到，“寇有赖短兵战，以大刀一项能济枪炮之穷”，“本馆有鉴于此现编砍刀术练习法一书业已出版”。这一手法一直运用了4年，师生们曾经幻想着敌寇就在眼前，早已练就砍杀敌人的手法。在抗日期间，充分发挥了这一特长，把敌寇打得

落花流水，真正实现了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，“据说日本为了应对大刀，还特地制作了一批铁脖套”（《青岛国术馆遭遇国难》）。

1941年，抗日组织青岛保安队在崂山成立，大队长就是杨明斋的得意门生高芳先，他和很多青岛国术馆的师生一起，在青岛保安队里继续传授武艺，让中国功夫在抗日战场上威震敌胆。

1944年，日伪当局为笼络人心，公开恢复武术活动，并在天后宫建立了健民社，“并继续在市乡各区分别设立分社支社”，由伪市长姚作宾兼任社长，但市区内的很多武林高手们拒绝出山，王子平就因此离开了青岛。

一年之后，抗战胜利，青岛国术馆重新建立，时任青岛市长李先良任国术馆馆长，高芳先任副馆长（后任馆长），武术运动得以恢复。1946年，青岛市教育局规定，全市中小学以上一律恢复增加国术科目。为培养师资，青岛国术馆举办师范训练班，直接为全市的国民中小学培训国术教师。随着国术馆的恢复，群众武术活动有所回升，市区国术练习所恢复到145所，学员5067人。每年一度的武术表演和比赛又开始活跃起来。

第五回

往事如梦已渐远，国术精神仍传承

1949年后，高作霖从西安回到老家，边务农，边教授弟子，后来兴办般阳武术社，将武术理念发扬下去，直至1989年以92岁高龄辞世。在青岛，国术馆的精神同样在传承，“上世纪50年代，一批上世纪30年代成长起来的、在国术馆训练过的拳师，对于青岛的武术发展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他们为发展武术事业，勤奋地传授各自流派的武艺。当时青岛武林知名人物有纪炎昌、孙文宾、马文章、周永祥、周永福、赵瑞章、李熙梦、孙玉君、李占

元、徐杰三、肖秋宾、秋宝山、杨福江、钟寿山、刘镜海、徐自良等”，于向阳先生说，1950年3月，青岛市武术研究会成立，武术研究会由孙文宾任主任，成员有杨福江、邱宝山、周永福、周永祥、李占元、赵瑞章、李熙梦等。武术研究会成立后，武术教场迅速恢复，不久从市区到崂山发展到100多处。如今，位于白云路4号的青岛市武术协会仍然为弘扬中华武术，振兴民族体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。

忆恩师

杜月英：师传武德终生不忘



现任青岛武术协会的副会长杜月英是位女中豪杰，她气质端庄，但又出手不凡。说起幼年的从师经历，真可谓无心插柳。杜月英出生于1948年，8岁那年，父母准备让她弟弟学习武术，“我陪弟弟去

找当时的名家李占元，李占元看了看我们说：‘不要弟弟，姐姐可以留下！’”阴差阳错，杜月英成了李占元的徒弟，跟着学了三年。11岁时，她考取了山东体育学院，跟着也曾任国术馆教习的周永福学习，从此杜月英走上了正规的学院式武术教育之路，15岁考取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，师从一代宗师曾庆煌。

提起武术学习期间令她印象深刻的事情，杜月英女士说，老师教的主要是防守，“李占元先生告诉我，练武之人不能打人，如果别人打你右脸，你就让他打你左脸”，如今看来不可思议的境界，让杜月英牢记一生。后来工作后，不少同事想让她露一手，她从来都是一笑置之。近两年，杜月英一方面遭遇了家庭变故，一方面身体有恙，动了一次大手术，但坚强的她挺了过来，“我会练太极拳和气功调节身心，身体恢复得不错，连医生都很惊讶，连连说我树了一个榜样”。

鲁勇：王子平无门户之见



文史学者鲁勇先生与武术结缘，与父亲有关，因为父亲鲁海先生5岁就接触武术，留下了一张当时颇为珍贵的毕业照。照片在家里挂了多年，鲁勇上小学时，对照片中的生活充满了向往。1958年

春末，机会来了，“我们家的世交，来自泰安的老乡、三代老中医的焦家爷爷由他大儿子焦中奎陪着来看望我爷爷。焦中奎从小跟着姑姑生活，姑姑和姑父相当于他的养父母。姑父与王子平是沧州同乡，又是把兄弟，所以焦中奎跟着王子平练武术学长拳，但并没有正式行拜师礼”，鲁勇先生说，因为这层关系，王子平毫无保留地将所学传授给焦中奎。这次鲁家与焦家见面，鲁勇的爷爷就将孙子想学武术的愿望告知了焦中奎，希望他能收孙子为徒。焦中奎答应教授鲁勇武术，但并没有行拜师礼。

就这样，鲁勇先生成了焦中奎没拜师的徒弟，练习蹲马步、十八路弹腿，主要练八卦迷魂掌，“文革”时期改名为八卦连环掌。多年的训练让他身手利落。就在前两年，人到中年的鲁勇先生还能给一米九二高的年轻人一个背摔。

让鲁勇先生受益匪浅的是，恩师的恩师王子平先生没有门户之见，他擅长的就教授给焦中奎，不擅长的就推荐焦中奎向他人学习，“这才是真正的大将风度”。